

中日关系的

光和影

王泰平 著

ZHONGRI GUANXI DE GUANG HE YING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中日关系的

光和影

王泰平 著

ZHONGRI GUANXI DE GUANG HE YING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日关系的光和影/王泰平著.—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8.5

ISBN 978-7-212-10099-5

I.①中… II.①王… III.①中日关系—研究 IV.①D822.3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93950号

中日关系的光和影

王泰平 著

出版人:徐敏

选题策划:刘哲

责任印制:董亮

装帧设计:宋文岚 陈爽

责任编辑:陈娟 袁小燕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地址: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八楼 邮编:230071

电话:0551-63533258 0551-63533292(传真)

印刷: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10mm×1010mm 1/16

印张:33.5

字数:500千

版次: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12-10099-5

定价:6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前 言

本书作者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起,先后作为记者、外交官和民间代表六度常驻日本,在日本工作和生活 20 余载。他根据自己的亲历、观察和感悟,并旁征博引,用通俗而清新的语言、翔实而权威的史料,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层面,评说战后 70 年来中日政治关系演变的轨迹,深挖其时代大背景和深层的原因,指出现时中日关系的阶段性、特征和发展趋势,概述日本在中国外交棋盘上的位置、新中国历代领导人的对日政策思想和中国政府的对日政策,披露了 1972 年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1978 年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交涉和谈判的内幕,阐述了指导和规范中日关系的“四个政治文件”的基本内涵及其历史和现实意义;还客观地勾画了日本的战后发展史,评论了日本的外交哲学、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和特征,解析日本人的中国观之嬗变,把一个真实的日本告诉读者,并指出日本绝非等闲之邻,与之理性相处,争取实现世代友好,是两千年交往史得出的结论,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本书虽属国际关系专著,但风格严谨而不失活泼,论述深刻而通俗,既不是板起面孔写正史,也不是随意泼墨写演义,而是用讲坛的语言交代重要史实,提出观点,夹叙夹议,尽量使读者在了解史实的同时,对日本这个国家和日本人的特征有个基本认识,对战后中日关系的演变有个整体概念,对中日关系的现状有个整体把握,并为展望中日关系

的未来提供一个思考的视角。

现在关于中日关系的著述不少,但这本著作立于作者的记者、编辑、研究者和外交官生涯几十年观察与研究之上的个性视角及得出的一些结论,且信息量之大及其宏观与微观的权威史料相结合而产生的可读性,相信一定会对国人尤其是青少年正确认识日本和中日关系提供有益的资讯。2018年中日邦交正常化46周年来临之际,编者和作者共同冀望本书的推出,能予诸位读者“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之飨。

代 序

中日关系处在转型期

笔者 1965 年大学毕业就进入外交部从事对日工作,到今年已足足 50 年了。回顾半个世纪以来的两国关系,可说是变化巨大,成就显著。1972 年建交时,中日贸易仅为 10 亿美元,而现在早已超过 3000 亿美元了,而且,那时是垂直贸易结构,我们用农水产品换日本的工业品,一吨大对虾才能换一吨钢;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的服装和轻工业品出口日本,只能摆在地摊上;现在从服装到机电产品,高级商店里比比皆是,中国造的商品进入了日本的千家万户。日本人一开始对中国货有抵触,现在观念转变了,有个日本人说:“我从头到脚从内到外穿戴的都是中国货,价廉物美呀,为何不买呢!”改革开放后,我们大量吸引日本投资,我们的工人给日本企业打工;现在我们向日本投资增加很快,不断并购日本的企业,许多日本人给我们的企业打工了。建交前去日本需绕道香港,最快也得三天时间;2009 年每周就有 1000 个航班往来中日两国之间,三个小时左右就到了,如果从上海或大连起飞,行程更短,跟国内旅行的感觉一样。中日建交前人员来往很少,到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主要是日本游客来中国,是我国第一大旅游客源;现在倒过来了,我们成

了它第一大客源,刚刚过去的一年里达到 500 万人次规模,致使中日航线变成了“黄金航线”,各航空公司纷纷扩充航线及航班数,搞得日本的饭店不够,大巴紧张;日本各地大兴土木,从北海道到九州,纷纷增建免税店。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在日本人眼里,中国人穷,即使到了日本,面对琳琅满目、光怪陆离的商品,也只能是看一看而已。20 世纪 70 年代我从日本回国时,只买了几双袜子、几件背心,手里确实没有钱哪。现在,中国游客购买力旺盛,到日本扫货,使日本出现一个新词——“爆买”,这个词获得了日本 2015 年流行语大奖。20 世纪 80 年代时,中国姑娘嫁给日本人多,很少有日本姑娘嫁给中国人的;现在,日本人都认为中国人富有,有不少日本姑娘找中国男人结婚。现在,日本女性中流行着一句顺口溜:“吃饭要吃中国餐,结婚要找中国男,法国情人早无戏,美国房子不靠边。”日本政府的人口变动统计报告显示,2007 年有 1016 个中国男人娶了日本女人,日本女人嫁给中国男人的年增加率是 15%。中国男人正越来越吃香。日本的中国信息研究机构的代表竹石健说:“其实日本女性也蛮势利眼的,看到中国经济大发展,中国人越来越有钱,当然瞄上中国男子汉。”当然,也不光是经济原因。有个嫁给中国人的日本姑娘在婚礼上直白地表达:“中国男人比你们优秀,首先他们知道爱妻子顾家,有责任心。”日本有评论认为,日本女孩愿意嫁给中国人有六大理由:一是中国男女平等观念要比日本强,二是中国的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样上班,三是中国男人对老婆很呵护,四是中国男人一般很顾家,五是中国男人大多能把收入全部交给老婆管理,六是中国男人度量一般比较大。从友好城市数目看,1973 年 6 月神户和天津结为中日间第一对友好城市,到 2012 年,两国间的友好城市已发展到 248 对,还有一些正在“恋爱”还未签“婚约”的城市。

中日邦交正常化 40 多年来,两国关系虽然发展很快,但一直是在克

服困难、化解挑战中前行的,冷暖起伏,风风雨雨,遭遇过严峻的挑战,发展历程绝非一帆风顺。有人说中日关系变坏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没做好,实际上是由于两国关系发生了阶段性变化,是时与势变化的结果,是形势演变导致东亚格局调整的表现。

战后 70 年来,也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 67 年来,中日关系经历了三个演变和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 1945 年日本投降、新中国成立到 1972 年实现邦交正常化前,是两国无邦交、敌对或称对抗的阶段,也是我们从民间入手,采取“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以“渐进积累”的方式,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从 1972 年复交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是中日关系空前大发展时期。第三阶段可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算到现在,中日关系处于由“特殊关系”向“普通关系”转变的过渡时期。

从实现邦交正常化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中日双方尽管在台湾问题、历史问题、领土问题等方面产生过一些矛盾和摩擦,但总的说来,友好合作是两国关系的主流,两国关系经受住了国际形势和各自国内政局变化的考验,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都达到空前的高度。

但应看到,1972 年实现的中日关系正常化,是我国领导人出于高度的战略谋划和政治判断,捐弃前嫌,以宽广的胸怀与日本达成的和解。所建立起来的关系,是以战胜国的大度和战败国的歉疚为思想基础的、强调友好的“特殊关系”。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围绕中日关系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殊关系”难以为继,“普通关系”势在必行。

其一,由于冷战结束,国际关系重组,世界格局大变动,中日各自调整外交战略,冷战时期的战略伙伴关系结束;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出笼,对美日军事同盟更加重视,使日本增加了自信,也获得了联手遏制中国的机遇。

其二,在日本,新生代政治家进入权力核心,急推国家政治转型。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战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政治家进入权力中枢,他们不像老一代政治家那样有“战争罪恶感”“战败国意识”,从而改变对我国的低姿态,意欲与我国建立以国益为基础的“普通关系”,进而在历史和钓鱼岛等问题上,挑战双方达成的协议和默契。同时,制造“中国威胁”论,为摘掉“战败国”的帽子,实现“正常国家”(一流国家,政治军事大国)的战略目标服务,导致中日关系矛盾和摩擦增多。

其三,中国发展太快,中日力量对比发生颠覆性变化。面对新现实,日本缺乏心理准备,失落感、危机感交集,失去自信,不适应,很纠结,不服气,担心报复受欺负,乃至视中国为威胁,成为中日间矛盾和摩擦增多的内在原因。

日本经济 1968 年超过德国,成为西方第二经济大国;1986 年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雄踞西方和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宝座 40 多年,使得日本当政者的世界老二、亚洲老大的情愫相当的严重;在日强我弱的情况下,它可以跟你友善,甚至可以帮你一把。开放初期我们资金极端匮乏,它开始向我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长期低息贷款,总共 400 多亿美元。现在你超过了,他受不了。

日本不能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是中日关系变坏的根本原因,钓鱼岛国有化只是个“导火线”而已。

1994 年日本经济总量相当于中国的 8.55 倍,达到战后以来的历史顶峰,随后中日经济差距迅速缩小,1997 年日本 GDP 降为中国的 4 倍多,2002 年降为中国的 2 倍多,2006 年降为中国的 1 倍多,2008 年之后两国 GDP 已比较接近。

再看中国,1990 年居世界经济第 10 位,1995 年超过巴西、西班牙、加拿大上升到第 7 位,2000 年超过意大利居世界第 6 位,2005 年超过法

国和英国居世界第4位,2007年超过德国居世界第3位,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10年我国GDP超过日本(原估计2015年超过日本,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提前了),意味着中日力量对比发生历史性逆转,意味着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优势消失了,对日本各界的心理造成巨大冲击,日本人自尊心受到损害,不舒服。日本国内不少人对中国发展感到不安,对我国军事力量持续快速发展和海空活动范围不断扩大疑虑加深,产生惧怕心理,提防中国的一面上升,将中国作为“假想敌”,一手拉紧日美同盟,一手加紧调整安全政策和军事部署。

日本统治集团认为,日本自身力量不够,只要加强日美军事同盟,就能有效地平衡中国,中国就不敢轻举妄动;而且,出于争夺亚洲事务主导权的考量,认为日本如果不站出来,就没有其他亚洲国家能与中国抗衡了,亚洲就会出现“中国一边倒”的局面,这是它不愿接受的。

中日间存在着结构性、深层次的矛盾。历史、领土问题属于结构性矛盾;不能正确认知对方的发展变化,不能客观理性地对待,属于深层次的矛盾。这两种矛盾叠加,决定中日关系的格局,借用时下十分流行的一句话,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日之间经济上的互惠与政治上的博弈共存将可能成为一个“新常态”。

表面看,目前中日矛盾有两个,一个是历史问题,即如何评价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所发动的侵略战争;另一个是领土问题,即有关钓鱼岛的领土主权争议。但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就不难发现,现在横亘于中日关系的上述矛盾,根本原因乃发轫于围绕中国和平崛起而展开的博弈。中国要崛起,日本谋抑制,是中日主要矛盾的本质所在,日本要迟滞中国崛起的进程和“规范”中国的走向。

用大国思维看待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的变化,很多是中国自身的变化引起的,是中日力量对比变化引起的。不看到这一点,就说不清楚。

20世纪70年代,我国重返联合国常任理事国;1999年20国集团成立,中国又成为20国集团最核心的成员之一,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两大变化使我们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分量越来越重,已处在相当中心的位置了。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6位跃升为第2位,2010年GDP占世界的比重从2000年的3.7%提高到10.5%,2016年占比为14.84%。

2015年,中国在西方垄断的最后一个“堡垒”——金融领域是“四喜临门”:

第一件是由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五国组成的金砖国家银行7月21日在上海开业。

第二件是中国倡导、57国共同筹建的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全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成立,弥补了现行国际机制的不足。

第三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简称IMF)将人民币作为第五种货币纳入IMF储备货币,美国终于通过对IMF这个由西方主导的国际机构的改革方案。IMF将“篮子货币”调整为美元占41.73%,欧元占30.93%,人民币占10.92%,日元占8.33%,英镑占8.09%。

第四件是中国成为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新股东。

这四件事标志着中国开始全面融入全球金融市场,意味着打破了西方垄断的最后一个堡垒,美元霸主地位开始动摇,是中国崛起为全球经济强国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过去 200 多年里,西方主导世界事务,东方得听西方的;现在,国际力量对比正在经历历史性的变化,西方垄断的局面被打破了,现今的美国也不是 20 世纪 80 年代的美国了。英国国际问题专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高级客座研究员马丁·雅克认为:“中美关系现已进入一个新阶段:中国虽不能说完全与美国平起平坐,但至少已在同一数量级上。”现在,中美合作也许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是,如不合作,有些大问题则解决不了,如中美双边气候变化协议的达成为联合国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的成功打下了坚实基础。世界上大事小事都需要中国表明立场,每个大问题上,中国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与五年、十年前大不相同了。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中国的变化,往往我们自己不如外国人看得更清楚、感知得更深。且不说一百多年前,在外国人眼里中国是“东亚病夫”,是任人宰割的一块肥肉,就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也是贫困落后的形象。可是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使得过去曾经欺负中国的列强们不得不改变态度。英国这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变化最为典型。

英国二战后是跟美国跟得最紧的国家,亦步亦趋,于是成就了“英美特殊关系”。丘吉尔曾在给艾森豪威尔的信中写道:“我向你保证,我们根本上与你站在一起。”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坚持英国外交中美国第一的外交原则,英国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可谓处于“蜜月期”。因此,英国被美国视为“最信任、最可靠和最有能力的盟友”。可事到如今,一切都变了。我们倡导成立亚投行,英国不顾美国的压力,积极参加,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成为加入亚投行的第一个西方发达国家。

2015 年春节时,卡梅伦首相对李克强总理表示,今后 5~10 年希望

开启英中关系的黄金时代,表示英国是中国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密切的合作者、最好的朋友。

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问德、法、欧盟后,英国很着急,提出要把2015年留给习主席,希望早定下日期。为此,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派她的孙子访华,带来亲笔信,给了两个时间,请习近平主席确认。习近平主席4月份给女王回信,表示尊重。女王在议会上专门宣布习访问事,又专门向我大使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来访,很在意。

结果,2015年习近平主席对英国的访问成为一次“超级访问”。三个超级:超级规格接待,超级成果,超级影响。

89岁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率领王室全体成员热情接待。习一行乘坐7辆金马车进入白金汉宫,4.5万人夹道欢迎。通过的林荫大道有6道防线,天上有直升机保护。查尔斯王储三次出面,亲自到白金汉宫迎接,谈话也很友好。卡梅伦出面12次,还陪同到乡间别墅,到外地。乡间别墅迄今只接待过奥巴马、普京等,这次与习在那里谈了四个半小时。安全上英国投入了超过一般国事访问4倍以上的警力,入住后,24小时全方位警戒。

英媒体报道称,习近平这次访问,“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国事访问”,英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达到二战以来最高”,“对中国的拥抱是20世纪以来英国外交最大的调整”。

是什么标志性事件或力量在推动英国人对华心态发生变化呢?英国媒体说,这是出于英国对世界走势的判断:过几年中国就是世界第一。英国专家马丁·雅克诠释道:“中英关系从冷淡转向亲近,根本性的推动因素是中国的崛起……”他说:“环视世界,不管俄国、德国、法国、卢森堡还是非洲国家,大家都在‘转向中国’,因为中国对各国国运至关重要。过去英国一直不太积极,往往落在后面,如今再不可置身于

大势之外,这也是英国自二战结束以来最重大的外交政策转变。”“中国的崛起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了一种‘万有引力’。如果把西方世界看作一座冰山,那么它在这股力量的作用下,已经开始出现裂缝。英国、澳大利亚都属于美国的传统盟友,但它们都开始以新的角度思考问题,即本国(而非整个西方阵营)如何从中国的崛起中获益。”

习主席对英国的这次访问对欧洲震动很大,各国争先恐后,竞相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马上飞到中国来了。默克尔对习近平说,你到德国来,会给你同样的待遇,只是我们没有女王。我们同欧盟的关系形成了良性互动,出现高潮。整个西方都在思考对华政策。

想一想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的时代,看看眼前,简直就像置身梦境一样,我们国家的地位确实变了,大变了,简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大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历来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小国往往把大国视为“威胁”,这是大国的宿命,而在这个大国强大后,“大国威胁论”更有市场。

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对中日关系产生了影响,而且导致了中国与外部关系的变化,国际形势的变化。我们的块头本来就大,现在发展到如此程度,周边国家产生疑虑,甚至发起挑战,都不难理解。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80多岁了,写过《日本第一》和《邓小平时代》,在中日两国都有很大影响。他去年11月来中国,我跟他就中日关系交换了意见。他说,中国现在经济规模超过了日本,而且中国的民族主义比较激烈,日本受到很大压力,很紧张;目前中日两国关系的主导面是中国,中国掌握着中日两国关系的主动权;日本现在兴起的民族主义,是对中国压力的一种反弹,但基本的态势是日本害怕中国。

情况的变化要求我们学会客观地看待自己,认清本国所处的历史

阶段和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在看到成绩的同时,对自身发展面临的问题也要有清醒认识,看到不足和差距,看到机遇和挑战。

机遇是战略性的,挑战是发展过程中的。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风险和挑战不仅来自外部,更大量来自内部,最大的挑战在国内。较量的输赢不仅在于警惕对手,更关键在于巩固自己。中国的问题最终取决于自己,自己搞好了,才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国际因素中,最大的问题是西方一些势力对中国逐渐上升的敌意。美国不会允许任何一个大国强大到挑战其地位。我们的GDP要赶上美国时,美国会铺天盖地地扑过来。中日美是一个三条腿的凳子,中国也好,日本也好,谁的腿长长了,美国就要削谁。20世纪80年代,美国通过金融战削日本,现在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美国是一定要想办法削中国的。只能当老大,不能当老二,这是美国自恋的“光荣与梦想”。当它感到谁有可能挑战它的老大地位时,它是决不允许的。

中国面临的国际挑战刚刚开始,更加严峻的挑战还在后头。关键是中国不断应对种种挑战,调整自己,以适应自己日益加强的全球地位。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认为,“中国能够实现和平崛起”。对于新兴大国崛起必然会导致国际冲突的说法和理论,奈认为,这是用19世纪的狭隘国际政治观来理解当代世界。不过,他认为,中国需要认识到新兴大国崛起总会引起现存大国的焦虑和恐惧。因此,中国需要通过软实力和负责任的行为,消除那些国家的焦虑和恐惧。

国内因素中,取决于在持续发展中解决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等难题,建立公正公平社会,把习近平主席的治国理念变成现实,保持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和持续发展。要认识到在全球化背景下不会存在“综合性的超级大国”,中国的未来发展,不应放在谋求对其他国家的“领先优势”上;应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打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和平

大国的形象、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民主国家的形象、共同富裕的民生国家形象,夯实走和平道路的基础。

关系回暖仍脆弱复杂,需继续努力

2012年日本政府购“岛”后,中日关系陷于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大危机,高层往来停止了,国民感情严重下滑。但是,中国并没有放弃改善关系的努力,一直在寻找机会恢复接触。我们是一面坚持原则立场进行斗争,一面不断地做工作。

以2014年APEC北京会议为契机,在达成“四点原则共识”的基础上,中日关系迈出改善步伐,但由于两国间存在着一些难以解决的结构性的矛盾和现实利益的冲突;由于日美不对等的同盟关系造成美国因素对日本的影响格外直接和严重;由于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反华势力抬头;由于中日两国在两千年的历史上,力量对比一直处于不平衡状态,而今天的力量对比正在经历一个半世纪以来未曾有过的变化,亚洲呈现两强并立的局面,日本政界和社会上对中国迅速发展的抵触心理,会对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产生影响,决定基本格局是既合作又竞争,既借重又制约,日本对华政策的两面性突出,并将长期存在。

尤其是安倍晋三首相第二次执政以来,为达到修宪强军、实现国家转型和抑制中国崛起的目的,极力渲染“中国威胁论”,并以中国为“假想敌”,在安全和外交上采取了一系列步骤,已经把中日关系从战略互惠的“正常国家关系”层级拉低到“战略竞争关系”的层级上了。这种做法如不改变,中日关系的真正改善是很困难的。

令国际社会感到困惑的另一个问题是,日本领导人和政府在重大问题上的表态往往是出尔反尔,使外界感到日本领导人很不严肃,缺乏诚信。这不仅严重影响日本国家的形象,而且还影响同其他国家的关

系。慰安妇问题就是典型。如果日本在国际上不能信守诺言,做不到“言必信,行必果”,做不到言行一致,就很难取信于国际社会。

更令人关注的是,近年来,日本又跟美国一唱一和,插手南海问题,企图把水搅浑,从中渔利。关于南中国海事务,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一直特别关注日本的言行。日本不是南海事务当事方,奉劝日本谨言慎行,不要以任何形式插手南海问题。日本应该清楚,任何国家企图通过炒作南海问题,渲染局势紧张,挑拨地区国家间关系,甚至进行军事介入来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都是徒劳的。如日本一意孤行,只能为两国关系制造新的困难,甚至可能引火烧身。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两国关系仍然脆弱、复杂而敏感,中日关系的改善是有限度的,两国关系的未来存在着不稳定性,将来还会有不少的曲折反复,甚至不排除倒退的可能。

理性看待和处理转型期的中日关系

中日两国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是永远的邻居。中日在两千多年的交往中得出一个结论:和则两利,斗则俱伤。

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新中国一直重视发展同日本的睦邻友好关系,视中日关系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主张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

近年来,日本有人认为中国对日政策变了,不重视日本了,这不符合事实。

习近平主席 2015 年 5 月 23 日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时讲话指出“中国高度重视发展中日关系,尽管中日关系历经风雨,但中方这一基本方针始终没有改变,今后也不会改变”,表示愿在中日间四个重要政治文件的原则基础上,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继续推进中